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0年7月17日 (第218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CATO学者驳斥“中国冲击论”

事实根本不支持美国政客和专家所谓的“中国冲击论”，假装美国在2000年有比对华贸易正常化更好的选择是错误的。

中美关系

中美冲突由结构性因素引起而非意识形态之争

《外交政策》杂志近日登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文章称，目前美国强硬派和温和派都错误地将中美竞争归结为意识形态之争，忽视了结构性因素。

沃尔特追溯了美国与纳粹德国、苏联和伊拉克的冲突，指出美国长期倾向于把冲突归咎于对手的内部特征（意识形态、国内体制或领导人个性）而非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目前对中国的分析方式也存在这种倾向。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样看的解决办法就是推翻对手，且这种解释忽略了中美冲突的结构性因素。

沃尔特称，目前中美竞争与特定领导人或政权类型无关，更多与双方的权力分配和所奉行的特定战略有关，领导人更替或国内的深刻变化都不会改变中美关系固有的竞争性质。首先，中美作为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互不相让的，因为彼此都是对方最大的潜在威胁。其次，战略目标差异加剧了竞争，中国希望周边环境尽可能安全，希望美国能离开其周边地区，而美国则希望留在亚洲以阻止中国在地区建立主导地位。

沃尔特称，基于对中美冲突的结构性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中美竞争将是长期性的；需要明智的军事投资、巨大的外交努力以及健康的亚洲盟友关系来应对；中美都需要控制竞争的范围，既要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又要促进在利益重叠的议题上进行合作，但华盛顿必须明确自己的红线，并确保了解北京的红线。

中美对抗不是新冷战

《华盛顿邮报》7月2日登载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

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和拜登任副总统时期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的文章称，近期中美关系观察人士常形容中美对抗是新冷战，但其实质更接近于新竞争。

文章称，中美竞争确实与冷战有相似性——两个“超级大国”在地缘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竞争中对峙，在多个地区争夺盟友和影响力。但用冷战思维去思考中美竞争带来的问题也许多于启示。不同于苏联和西方以阵营对抗为主且相互很少有经济活动，中美并没有形成这样的阵营对抗，且彼此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文章认为与其说中美对抗是冷战的重演，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竞争，这种竞争避开了诸如遏制和接触这样过去界定美国的大国政策的概念。因此，千篇一律的冷战政策，如建立反华军事联盟、采取遏制战略或全面的经济战，既不适合，也不可能成功。文章认为，美国需要为与北京进行更加差异化的竞争做准备，对华政策的重点不应是自上而下讨论如何发动或避免冷战，而是自下而上努力重振美国的竞争力，对具体问题进行更严肃的辩论。

其中，有些战略将是遏制式的，如阻挠中国输出高科技“专制主义”；有些更具防御性，如在南海防止中国建立主导地位；有些则需要关注美国国内政策，比如推动国内创新；在气候变化和防扩散等领域，与中国合作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其他领域，华盛顿只需承认中国影响力上升对美国没那么重要。此外，争夺盟友的竞争将不再是战略结盟，而是就不同问题建立联盟。

美学者：欧洲或将进一步转变对华战略以限制中国影响力

布鲁金斯学会美欧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近期发表报告《欧洲改变了其对中国的看法》称，欧洲或将进一步转变对华战略，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

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欧洲国家不情愿地将其对华战略从以经济接触为主转变为出于安全原因而限制中国影响力。尽管欧洲在对华战略的转变上远未达成一致，但除非中国行为变得更加良性，否则欧洲的战略转变似乎还将继续。

报告认为，欧洲未来的应对措施可能会有以下几点：通过投资控制和其他经济措施保护欧洲公司和知识产权不受中国“掠夺性行为”影响；欧盟 27 国和北约将更加团结以抵制中国的胁迫力量；欧洲将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自由准则。欧洲国家不会有能力或意愿对东亚的力量平衡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它们将在对抗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报告进一步向美国决策者提出建议：美国应该通过维护开放的跨大西洋经济来帮助促进欧洲的努力；有选择地对欧洲施加压力；与欧盟就中国问题展开正式对话，并确保将英国纳入其中。报告称，最终，如果欧洲在中国问题上提高战略自主性，这将对美国有利，基于广泛利益的欧盟政策比基于狭隘的经济利益诱惑的政策要好得多。

企业研究所发布中美部分经济“脱钩”指南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 7 月 7 日登载该智库亚洲经济研究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的报告《与中国部分经济脱钩的指南》。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称中美经济“脱钩”利大于弊。

第一部分解释了美国应与中国“脱钩”的原因：一是中国对国有企业提供极高补贴，打压了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二是中国开展各式各样窃取技术的行为，如侵犯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网络攻击、获取商业秘密等；三是疫情使美国意识到过于依赖中国供应链影响了美国的危机处理能

力；四是中国在国内外都有一系列的专制主义行为。

第二部分为美国如何部分经济“脱钩”提出了建议，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美国贸易代表应该充分记录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第二，利用《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款来设置对中国在美国销售的必需品的内容范围，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第三，行政部门和国会应在激励措施之外建立新的协议，以确保一些关键供应链完全留在美国及其盟国；第四，商务部应立即执行国会授权的出口控制政策，使技术而非单个终端用户成为管控的重点；第五，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新机构以监督美国在华投资，禁止对损害美国利益的产业进行投资。

第三部分分析了中美部分经济“脱钩”的利益和成本。报告认为，与中国持续的“经济掠夺行为和专制行为”相比，与中国“脱钩”的经济成本相形见绌。短期内，抑制进口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转移供应链将需要数百亿美元的资金，中国的反击会打击美国公司的销售。相比之下，收益则很难衡量。不过，“脱钩”主要是关于避免损失而不是产生效益。

报告认为，与中国经济“脱钩”可降低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减缓中美之间的资金和技术流动，将减少中国解放军可得到的资金和技术，以减少发生毁灭性军事冲突的几率；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意味着将削弱中国破坏法制的的能力；“脱钩”可以打击中国对技术的窃取，鼓励全球创新行为。“脱钩”的核心变化将是降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扭曲”，这将重新分配一些经济利益给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将振兴美国造纸业和日韩造船业，并保证许多现有的、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可以留在美国。

CATO 学者驳斥“中国冲击论”

事实根本不支持美国政客和专家所谓的“中国冲击论”，假装美国在 2000 年有比对华贸易正常化更好的选择是错误的。

卡托研究所网站近期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林西科姆 (Scott Lincicome) 的报告《考察“中国冲击论”——与中国贸易正常化是一个错误吗》，驳斥了“中国冲击论”。

报告指出，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公民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贸易和全球化损害了美国的工人阶级，2000 年美国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 地位和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是中国崛起的关键驱动力，中国在 1999 年至 2011 年对美国出口的大幅增长导致美国失去约 240 万个就业机会。

对此，报告根据对相关经济学和历史的解读指出了这种“中国冲击论”的谬误所在。

首先，报告援引大量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冲击论”忽视了过去二十年来美国与中国贸易增长所带来的有据可查的好处。21 世纪初的对华贸易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充足的利益，也为美国公司，包括制造商和工人，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中国冲击之“大”并不主要因为中国，而是其冲击美国的时间正好是在美国对某些商品生产进行区域性转移期间。因此，美国低技能制造业就业的持续低迷很可能并非贸易问题造成。经济学家们在各种贸易和就业数据的支持下，一再公开表示对把美国制造业就业大幅下降归咎于中国贸易的说法持保留态度，这应该引起美国政客和专家们的注意。

其次，报告指出持“中国冲击论”的人士对于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认识是歪曲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其市场和工人暴露在中国出口竞争之下，中国在此之前一直拥有最惠国待遇，“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只是加速了已经在进行的双边经济融合。更重要的是，“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并非中国冲击的唯一动力，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动力。研究表明，中国带来的冲击主要来自于中国入世后自身关税削减，以及中国在私有化、贸易权和进口自由化等方面进行了内部改革。

报告指出，“中国冲击论”展现的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也是扭曲的。中国入世的过程并不草率，中国最终的入世方案包含了迄今为止所有入世成员中最多的、至今仍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深入的承诺，其中包括许多附加承诺。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谈判中，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政府做出更多让步。有研究表明，美国政府批准中国入世的主要原因并非为了在中国推动民主化，而是着眼于美国的利益。

报告指出，持“中国冲击论”的批评者在批评中国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美国自身的不良政策选择，其中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未能对税收、贸易和移民政策进行深化改革；未能调整援助手段和工人再培训项目以减轻贸易、技术或文化剧变所带来的影响；继续实施了税收、教育、职业许可等一系列不利于劳动力调整和经济活力的政策。这些政策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与对华贸易正常化毫无关系，而将这些政策不可避免的失败归咎于中国，则使这些政策（以及实施这些政策的美国政客）失去了应有的监督。

报告总结称，事实根本不支持美国政客和专家们的“中国冲击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混乱是真实的，但在今天，假装美国在 2000 年有比对华贸易正常化更好的选择是错误的。这种论证可能会导致真正糟糕的治理：增加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原谅美国政策制定者、首席执行官和工会在过去二十年中的政策失败；

阻止对真正的政策解决方案达成政治共识。美国未来在贸易和全球化方面的决策需要考虑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

美国外交

美学者称朝鲜战争有助于解释当前美中对抗的本质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7月9日登载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国家情报官保罗·希尔（Paul Heer）的文章称，朝鲜战争和今天的美中对抗，在某种程度上都以相似的假设为基础，回顾朝鲜战争有助于解释今天美中对抗的本质。

希尔称，70年前，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华盛顿的东亚战略。朝鲜战争改变了美苏对抗，使其从一场系统性的政治竞争演变为意识形态驱动的军事化冲突。美国的东亚战略在战争前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战争爆发前，华盛顿认为朝鲜半岛在战略上无关紧要。但战争爆发后，为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扩张，杜鲁门政府立即决定进行军事干预。这一战略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具体体现在美国在该地区扩大军事存在和军事承诺的一系列政策上。然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对共产主义动机和野心的误解和夸大。美国政府没有考虑到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实际情况，加之美国国内反共情绪狂热，使其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到影响。

文章称，70年后，许多同样的因素驱动着美国的东亚政策，只是挑战者从苏联变为中国。美国当下的政策仍然是以夸大共产主义的动机为基础的，认为中国在东亚追求一种敌对的、排他性的霸权，并试图将其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无疑对美国构成了深刻的战略挑战，但很少有人关注到中国

的国际行为是防御性的，其驱动因素是不安全感，也很少有人关注北京希望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愿望。

文章称，正如 1950 年一样，美国国内政治也正在助长这种夸大的威胁认知，且急于采取对抗性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时代的政治话语两极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人的怨气和脆弱感，催生了一种新版本的麦卡锡主义。如此发展下去，美国极有可能重蹈冷战的覆辙。

美学者称美国和伊朗可能误判了彼此的政策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普尼特·塔尔瓦（Puneet Talwar）撰文称，美国和伊朗对对方的看法都不够清晰，有可能导致误判，进而引发紧张态势升级。文章摘要如下：

两年前，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选择了“极限施压”政策，误以为制裁能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并作出更大让步。然而，伊朗以“极限抵抗”政策作为回应，并加快了其核项目的进度，双方甚至发生军事摩擦。特朗普政府认为，制裁让伊朗陷于危机。然而，尽管伊朗经济形势的确严峻，但制裁让伊朗强硬派在国内掌握了更多权力。特朗普还低估了重启谈判的难度，对于伊朗革命政府来说，比起经济困难，他们认为向美国屈服是更大威胁。

伊朗当局也面临在误读对手意图基础上制定政策的风险，尤其是如果他们把特朗普的话当真的话。伊朗试图通过推进核计划和攻击美国在波斯湾的合作伙伴来增强影响力。伊朗不想要战争，但它可能认为特朗普更不想要战争。伊朗当局可能还不能完全理解，特朗普不能在自己的选民面前显得软弱，尤其是在选举年。

奥巴马之所以能和伊朗达成协议，除了施压，还有两点也至

关重要，即认识到伊朗核项目对美国的威胁，并且得到主要大国的支持，但这两点现在都不具备。美国现在唯一的外交选择是通过调解人向伊朗传递信息。此外，采取人道主义姿态也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不过，双方都不太可能走上这条路，因为他们互不信任，并且都认为自己的战略是有效的。未来，美伊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还会升级。

传统基金会专家鼓动美继续强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传统基金会网站登载报告称，“四方安全对话”（Quad）在 2008 年初宣告失败，如今，Quad 全面复活，开启“2.0 版本”，美日印澳四国之间合作逐渐加强，印度与其他三国关系日益融洽。

报告称，自 2017 年 11 月重启以来，Quad 成员国已经举行了五次会议，将对话提升到部长级，并为四边讨论增加了新的内容，包括网络安全和反恐。虽然进展缓慢，但四边合作的体制框架已经建立，而且可以迅速扩大，以应对未来威胁。

为了保持 Quad 的复兴势头，报告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将危机应对、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列入 Quad 的议程；组织领导人会议；充分利用 Quad 共识；加强协调，为印太地区提供更多基础设施选择；完善 2018 年的《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开发法案》（简称 BUILD 法案）；带着战略目的建设蓝点网络（BDN）；吸引东盟；探索防务合作新形式；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扩大太空和海洋领域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分析中美竞争对世界各国的影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载文，登载了 2020 年初该中心

专家布鲁斯·琼斯 (Bruce Jones) 对菲奥娜·希尔 (Fiona Hill)、坦维·马丹 (Tanvi Madan)、阿曼达·斯洛特 (Amanda Sloat)、米雷娅·索利斯 (Mireya Solís) 和康斯坦茨·斯泰尔岑穆勒 (Constanze Stelzenmüller) 等学者关于中美竞争的采访，主要观点摘译如下：

印度：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挑战之一。就中美关系而言，印度得益于两个大国之间恰到好处的竞争。中美双边关系的加深和回暖将意味着印度对两国的重要性降低。如果中美关系变得过于冷淡和充满竞争性，印度需要担心这在亚洲将产生不稳定的影响。

日本：日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夹在中美之间的具有挑战性的位置。日本与中国经济高度一体化，但其国家安全仍然依赖美国。随着中国开始更积极地维护其在该地区的主张以及华盛顿在亚太地区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日本有理由相信，即使其与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性目标不一致，其与中国的高度经济一体化也使其无法启动全面“脱钩”。日本仍然可以利用其作为亚洲金融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发展其国际经济战略。

欧洲：中美之争在欧洲数字领域尤为突出。虽然欧盟仍然是欧洲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但中国正在缩小差距，欧洲人越来越意识到并关注中国的影响力。尽管其成员国继续在国家层面上与中国接触，但欧盟 2019 年集体承认中国是“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同时，欧洲人发现，华盛顿目前对中国的做法过于激进，而欧洲并不希望被挤在美国和中国之间。

德国：德国由于与中国深厚的经济联系和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成为中美竞争的关键点。美国和中国都将德国视为推行其地缘政治战略的试验田，德国自身也开始制定更加广泛的对华战略。在过去十年中，柏林制定了中亚和印太战略，并积极寻求

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同时，北京也将德国视为一个国家在经历大动荡后重塑自我的典范。

土耳其：土耳其可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它给北京带来了独特的挑战。两国经济联系在缓慢增长，但两国关系仍被竞争和不信任所破坏，埃尔多安总统曾公开表示对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的态度感到担忧。拥有重要地理战略地位的土耳其是一个观察中美竞争如何展开的有趣地带。

俄罗斯：俄罗斯与美国有敌对的历史，但与中国的关系则更为悠久和复杂。俄罗斯官员对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扩张领土以及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海军计划保持警惕。尽管双边关系紧张，但俄罗斯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并对美国在其“后院”活动感到厌恶。虽然中俄没有正式结盟，但可以观察到中俄的政策日益趋同，都旨在利用西方的弱点。

在中美两国竞争越来越激烈之际，各国与这两个大国当前和未来的关系中面临着越来越困难的决定，尽管这篇采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开展的，但鉴于疫情并没有开启中美两国的合作，而是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态势，当新冠危机退去时，中美关系中先前存在的张力将重新出现。

美国政治/其他

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使其失去郊区的中间选民

《华盛顿邮报》近日刊文称，特朗普强调“白人权力”的强硬言论正在让他失去郊区摇摆选民的选票。

文章称，特朗普若想赢得 11 月的大选，需要郊区摇摆选民的支持。2016 年，他以 5 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郊区的选票，

然而，在最近的种族骚乱之后，拜登在郊区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25 个百分点。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弗洛伊德事件”以来，特朗普的言行反而使种族间的紧张形势变得更糟。特朗普毫不妥协的言论正在赶走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

不过目前的经济形势对特朗普有利，经济复苏比预想的更快。这意味着特朗普很可能从中受益，因为尽管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不高，但在经济方面，相比拜登，选民们更信任特朗普。

文章称，许多不满特朗普的美国人也知道，让他连任符合自己的利益，特朗普必须让这些选民根据自己的利益投票，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拜登则努力让特朗普的支持者叛变，他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温和的候选人，称自己反对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倾向。

文章称，特朗普需要用体现同理心和怜悯心的话语来替代强硬的措辞，让自己更容易被选民接受。如果特朗普不停止发表煽动言论、不凝聚力量，他会失去数百万张选票。

美智库称美两党达成共识，欲破坏美贸易政策

卡托研究所 7 月 1 日登载该智库贸易中心主任丹尼尔·埃肯森 (Daniel J. Ikenson) 的文章称，国会未能对特朗普政府破坏性的行为提出真正的反对，这暴露出国会的无能、怯弱和共谋推动美国退回到保护主义的心理。

美国的贸易政策近年突然大变，采取的措施使美国人的贸易自由大减。特朗普政府不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对近 4000 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推高了美国制造业成本和全国消费价格。特朗普政府还滥用贸易法，蔑视国会让予行政部门的权力。特朗普政府的非正统行为不啻于摧毁贸易政策作为推进经济增长和发挥美国软实力的工具，而国会却听之任之。

特朗普政府试图将贸易政策从利用经济活力并创造机会的工具转变为保护美国人免受这种活力影响的屏障，这一直以来都是国会民主党人的目标，现在也得到了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

最终，这种大肆吹嘘的两党合作已经以一种保守的、卑劣的、由不满驱动的贸易政策的形式，重返华盛顿。政客们一致认为美国困境的根源在于他国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立场是危险和错误的，很可能会加速美国的孤立和衰退。

民调显示拜登的质疑者主要为民主党的温和派

美国胡佛研究所 7 月 7 日登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布雷迪 (David Brady) 等的文章称，在 11 月份的大选中，拜登的危机来自于中右翼民主党人，而不是自由派。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目前的主要弱点在民主党内。他已经转变了一些政策立场以安抚左翼民主党人，但此举有失去民主党内温和派的风险。民调机构 YouGov 7 月 1 日的一份民调显示，拜登似乎获得 90% 的“自由”或“非常自由”的民主党人的支持，其余 10% 的人没有明确表示他们会把票投给特朗普。相比之下，拜登在民主党内温和派和保守派中的支持率为 81%，12% 的温和派和保守派人士称，他们将把票投给特朗普。

拜登最近在民主党内温和派中面临的困境，可能与其最近采取的吸引民主党内桑德斯-沃伦翼选民的行动有关，譬如提议提高公司税和高收入者的税率，实施每小时 15 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将医保资格降低到 60 岁等。虽然拜登没有支持“全民医保”或“绿色新政”——民主党内“非常自由”和“温和”派选民在这两项政策上有很大分歧，但拜登明显在经济上向左派靠拢，这

可能会导致他失去一些在财政上更加保守的民主党人的支持。

拜登对竞选伙伴的选择可能改变他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相比于沃伦和卡马拉，选择知名度较低的候选人，可以让拜登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直接影响，但也会产生难以预测的其他影响。

从目前来看，拜登在 11 月份的大选中对特朗普有明显优势。但如果特朗普设法让民主党人重新关注其党内的紧张局势，拜登可能会面临风险。拜登知道他必须满足进步民主党人才能成功，但进一步采取偏左的举措有失掉更加温和的选民的风险。

特朗普的“文化战”策略在大选中或难以奏效

美国《政客》杂志网站 7 月 9 日载文称，在 2016 年大选中，特朗普曾靠“文化战”策略成功入主白宫，但该策略在今年的大选中可能不会奏效。

特朗普的一些高级顾问希望他聚焦重振经济的计划，称这可能使他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提高 5 到 10 个百分点。卡尔·罗夫(Karl Rove)等非正式顾问公开敦促特朗普制定第二个任期的议程，称关注移民、贸易和能源议题能够激励选民。白宫幕僚长梅多斯等人希望特朗普多谈论法律和秩序，称这将吸引郊区的女性选民。

虽然特朗普常触及上述议题，但特朗普偏爱的“文化战”最近吸引了最多关注。该策略曾帮助特朗普在 2016 年大选中获胜，但其顾问们认为，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经济、警察暴力在全美范围内引发抗议以来，现在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种环境下，选民可能不易接受分裂性的文化战议题，尤其是独立选民、老年人、郊区女性和一小部分非裔美国人，而特朗普必须获得他们的支持来赢得威斯康星、俄亥俄州或宾夕法尼亚等摇摆州。

几位共和党战略家也表示，重启“文化战”并不是调动特朗

普铁杆选区之外选民的好办法。选民现在关心的是特朗普是否能领导美国走出疫情和衰退这两个危机，而不是其他。

人口结构变化对特朗普选情有何影响？

《大西洋月刊》杂志网站近日载文称，为了竞选连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一再重复前总统尼克松最令人难忘的口号，承诺为“沉默的大多数”提供“法律和秩序”。然而，如今的美国与尼克松时代截然不同，尤其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特朗普及共和党而言，有利有弊。文章摘要如下：

自尼克松时代以来，作为重塑美国政治格局的最大因素，人口结构在种族、教育和宗教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从 2016 年共和党初选开始，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就成为特朗普最大的支持者群体。调查显示，在 1968 年的总统选举中，这一群体占有所有选民的近 80%，而至少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白人约占选民的 15%，非白人美国人（几乎全部是黑人）占不到 10%。而根据无党派组织“变革之州”的预测，今年 11 月的大选中，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白人可能占选民总数的 42%。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和其他种族选民均将占选民总数的近 30%。

宗教构成的变化同样引人注目。根据盖洛普资深编辑杰弗里·琼斯（Jeffrey M. Jones）提供的数据，1968 年，白人基督徒占美国成年人总数的 85%，而根据无党派机构公共宗教研究所（PPRI）的最新数据，他们现在只占 42%。1968 年，非白人基督徒只占美国人口的 8%，如今该比例增加了两倍，刚刚超过 24%。

社会结构的其他变化也同样深刻。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显示，现在已婚成年人所占比例比当时小得多；如今只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住在大城市以外的小城镇或农村社区；至少有一些大学教育

经历的人口大约是当时的三倍。

特朗普希望动员的群体——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不住在城市的、已婚的、信奉基督教的白人选民，在过去 50 年里所占的比例显著缩小，而与他最疏远的群体包括在这几十年里快速增长的一些群体，如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白人之外的种族、世俗人士、单身人士和大城市地区的居民。

此外，特朗普在效仿尼克松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另外两大挑战。一是犯罪率，尤其是暴力犯罪率，不像 20 世纪 60 年代那样能为“法律与秩序”口号提供有力支撑。暴力犯罪在 1991 年达到顶峰后，在大约 15 年的时间里稳步下降。2008 年到 2014 年，暴力犯罪率下降，然后在 2016 年上升，之后再次下降。

特朗普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种族态度发生了转变。当时，许多焦虑的白人选民真诚地相信尼克松能够推进法律和秩序；但如今，许多美国白人，尤其是那些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认为特朗普本人正在增加混乱无序的风险。

不过，并非所有变化都对特朗普不利。如今，美国人口已经老龄化，年长的白人选民仍然能够接受特朗普关于文化和种族分裂的信息。50 年前，南方的福音派教徒大多倾向于民主党，而现在他们成为共和党联盟的支柱。据昆尼皮亚克大学的调查，在没有学位的白人选民中，有相当多的人表示，特朗普当总统让他们感到更安全。PPRI 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琼斯（Robert P. Jones）表示，当时许多北方白人天主教徒可能会对特朗普式的针对移民的攻击感到厌恶，但现在“当特朗普谈到让美国再次伟大时”，他们中更多人“认为自己是受保护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巩固了共和党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中的可靠优势，这比他们在尼克松时代享有的优势要大得多，但在未来几年，仍有一些数字将对共和党不利。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